

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

李 濟

前 言

八年前，我曾在與今天同樣的場合，就是在蔡子民先生八十七歲的紀念日，講「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今天，我又在蔡先生九十五歲誕辰紀念日，把這同樣的題目再談一次。

八年前所講的重點，是由考古學的立場，說明若干考古工作的結果對上古史的貢獻，及其相關的問題。這次所講的着重點，却完全不一樣。這個着重點是根據史學家的察古今之變的立場，把中國上古史整個的問題，做一個全盤的討論；所用的材料，都是近五十年來，很多科學家辛勤工作累集起來的。這些工作，大半是五四運動以後的北京大學，及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的中央研究院所領導的。在這個時代的初期，這兩個機關，都是蔡子民先生所主持培植的。我今天把這些材料做一個總討論，覺得這是最可以紀念這一位中國學術界最偉大的人物的誕辰。

(綱要)：甲 引言

乙 問題的性質

丙 材料的範圍

丁 材料的選擇

戊 古史料的整理與古史的寫作

己 可以供史學家參考的幾條意見

甲 引 言

七年前，一九五四年的冬天，我從墨西哥講學，經北美合衆國返國的時候，路過西雅圖城；城內華盛頓州立大學，附設的蘇聯與東亞研究所的幾位朋友，留我在那裏講半年書；並且指定要我講中國上古史。這是我對於中國上古史全部問題，作一個全盤打算的開始。這一路的思想，就我個人說，是一條新的路線；因為，我雖說是作了將近三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並且常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直到那個時候爲止，我却沒有做過寫中國上古史的這個夢。但是，環境的演變，逼迫着我在一個國外的大學裏，講中國上古史這門課程，我就不能不細想想，這部歷史究竟應該從何處講起。

這一新的路線，雖說是鼓起了我不少的興趣，却並沒把我的全部時間佔去。在這七年間，我也並沒有把全副的精神用來對付這個問題；不過，這個興趣既然是已經鼓動起來了，就好像是一股下流的水，雖在流的途中，遭遇着不少的障礙，仍是一直在向下流。我對於中國上古史的整個問題，在最近七年來，表面上雖然只是斷斷續續地活動；事實上却没有間斷過。說得更切題一點，我最近七、八年的工作，及若干研究問題的佈置，多少都與這一主題有關。今天，我要趁這個機會，把我這幾年所想到的，就是與重建中國上古史有關的意見，再提出來請諸位先生指教。

乙 問題的性質

我想把這一件工作的討論，用一個問題的方式提出。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問題的複雜可能牽涉到與“人”的研究有關的若干科學——包括這些科學的研究範圍。例如：“中國上古史”這一個名詞，本身應有的含義，就應作個甚麼解釋？爲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可以把這五個字的名詞，從最後一個字說起；就是從“史”字開始。傳統的說法對於這個字雖說是沒有嚴格的、固定的界說；但是，歷史學家都不言而喻地同意：他們研究的範圍即“史”的範圍，全是有文字記錄的事件。不過，現在我們又不能不承認有“史前史”或者“先史學”這些名詞；並且在大學已有“史前史”這一課程；這就把史學家先前所默認的那一界說完全衝破了。我曾經翻閱過最近五十年以來，中國史學家所編的大學歷史教科書；這裏邊，固然有很多謹慎的作者，仍舊抱着那個舊的定義，把中國的歷史，只從有文字記錄的這一段開始說起；同時，也有不少的史學家，大量地利用新的地下出土的沒有文字的史料。這派新的史學家的見解及方法，可以說是日日在那裏滋長。他們的見解，就是最嚴格的保守派的史學家，也不能不加以注意。所以現在所謂“史料”，已經不能完全以“有文字記錄”的材料爲限。我們不但要照顧到這些新發現的啞吧材料；並且要給它們以很大的重量，做我們歷史研究的根據。

第二說到“上古”，這又是一個不容易下簡單界說的兩個字。在中國這個區域，我們把人類的歷史，究竟可以推到多遠的過去？這可以說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一個很要緊的節目。

這個問題的解決，大半要看各人對整個“人類的原始”問題是什麼樣的見解。簡單一點說，這一個大問題中的大前提，包括着接受進化論的基本觀念在內。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時期，史學界裏，很少有人仍舊相信：人類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相反的，差不多所有有過現代生物學一點基本常識的人都同意，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是一步一步地演進出來的。但是，這一信念，就是由進化論這一基本觀念發展出來的。再由此推引的人的初生問題，即：——生物的演變，到了什麼階段，才能算是到了“人”的這個階段？若是我們講中國上古史，我們就不能不講全部人類在中國這一區域演進的這一段歷史。我們必須從人類在最早出現的日子開始講起。早到什麼時候？什麼階段？這個生物學家仍在爭論中的問題，雖不在史學家研究的範圍中，我們講中國上古史，拿“上古”兩個字說，却不能不追尋到人類原始的這一時代。

再說“中國”這兩個字，似乎不應該有什麼可以討論的了！但是，把它與“上古”連帶起來說，也發生了問題。因爲，年代說遠了，可能說到現代中國的地勢與地形尙沒有完成的那一時期。譬如：黃河、揚子江這兩條大河流，可以說是歷史學家歷來認爲與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的發展分不開的歷史地理。但是，若推本尋源地講中國上古史，就可以推到了一個時期，黃河與揚子江，這兩條大水，還沒有統一它們的水道以前的洪荒時代。不但如此，就是分佈在各省的大山脈，應該是比水道固定些吧！但是，地質學家告訴我們，中國有些山是在繼續不斷地

活躍，常有大小不同的變動。如太行山、秦嶺以及崑崙山、賀蘭山等等，都是活躍的山脈。它們現代的形態與高度的形成，是否比人類在這個區域出現的年齡老？這是一個富有意義的問題。

所以，把中國上古史這五個字連綴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大串與自然科學分不開的重要問題。換而言之，我們講現代人類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屬於人文科學的範圍；同時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學研究的題目。

丙 材料的範圍

有了這些問題，我們談中國上古史，第一個責任，就是根據現在可以得到的材料，來解答它們。我說可以得到的材料，也可說是現成的材料，在各博物館及圖書館能查到的資料；不是懸想的，想做而尚未做到，想蒐尋而尚未蒐尋到的材料。據我個人涉獵所及，現在已經有的，與中國上古史有關的材料，雖說是不多，但也有一個相當的數量。這裏邊有很多是可以——至少部分地——解答我們剛才所提出來的各種問題。讓我把它們列舉出來，說明這一意見：

第一、在我們的問題中，一個最重要的項目，就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這一課題。討論這個題目的資料，自從十九世紀末，在爪哇發現“猿人”以來，可以說是，已經累集到了“汗牛充棟”的程度了。這裏邊有很大的部份，是與東亞這一區有關的。這一類材料的性質，固然大半是屬於人體解剖學，與生物

學；同時，處處也要牽涉到人類原始的討論，並且大部份都要講到東亞現代地形尚未形成以前的地文與地理，以及氣候、動植物移動的這些事實。此外，我們也應該了解，人類的原始，不是地球上任何區域所能限制的問題。人類的起源是一個全球性的，整個人類關懷的大問題。所以，與它有關的資料，在地球上各區域，處處都有發現的可能。能够看到這一點，我們同時也可以了解，這一類材料是如何的廣泛了。

第二、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種研究的結果。

第三、人類的文化遺跡。科學家對於人的起源，雖說是尚在爭辯中；但是對於“真正人”的定義，人類學家已經漸漸同意到幾個界說了。界說中最重要的，就是說，所謂真正“人”者，就是能做工具的動物；只有“人”這個動物，照動物學家的定義，才能使用工具。這也就是“人爲萬物之靈”的定義。我們對於有文字記錄以前的人類歷史，雖感覺到荒渺難稽；但是，對於這些能做工具的動物，所留下來的工具，已經有法子辨別；並且，已經找出來相當的數量。在中國這一領域內，經過五十年來考古學家不斷地研究與尋找，也把這些早期人類所留下來的使用過的工具，找出了不少。這一類材料的尋找，以及研究，我們叫做史前考古學。史前史所稱道的人類的遺跡，大半是指這些古器物說的。

第四、體質人類學。這批材料是最接近現代人身的材料；這一類包括古代人所留下來的身體的遺骸。埋葬的風俗，在人類

全部的歷史過程中，是很晚的一個發展。但是自從這一發展開始，先前人類留下來的骸骨，就漸漸地保存在地下。時代愈晚，保存的方法愈比較地周密，留下來的骸骨，也漸漸地多了。

這些人骨的比較研究，可以說是構成了研究人類體質，尤其是在最近一萬年內的人類體質演變的基本資料。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人類身體與環境的關係，及他們分化的過程，與可能的原因。史學家對於地球上分佈的人類，向來是依照他們的習慣、語言及體質表面的不同點，加以類別；並曾經強調這些分別，做了若干推論。但是，就體質人類學說，好多這一類的推論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們應該注意，只有體質研究的資料，是研究世界人種問題所需要的最正確的資料，更可以用作分析各民族歷史中的若干趨勢。

第五組資料包括“狹義的”考古學發掘出來的。所謂“狹義的考古學”資料，是指過去古器物學家一般所承認的考古資料，大半屬於有文字紀錄的時期，也有較早的；但是，不會很早。具體一點說，大約是青銅時代，及這時代以後的歷史。這門學問在我國發展很早；這是中國學術界一頁很光輝的事件。因為在採集方法上，與看法的不同，這批材料的價值，在過去，都沒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注意。現在，經過比較嚴格的採取方法，及審訂標準，它們的重要性，就純學術上說，也增加了不止十倍。這批材料，在地下保存的特別豐富。

第六組材料，乍聽起來，與上古史似無關係；但是，這批材料已廣泛地為史學家所利用。這便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

民族學也是包括很廣的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他們的工作，在過去，大半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以及他們的體質上。

直到現在，我們知道在世界若干角落，尚有好些原始民族生活着。譬如：與臺灣相近的新幾內亞、南洋羣島以及臺灣的高山族；再推廣一點，殘留在中國大陸的若干原始文化。有關這些民族的文化與體質的研究，也構成了很大數量的一批資料。它們與上古史的研究有些什麼關係？相信進化論學說的人，同時也相信：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代表現在所謂“文明人”的老祖宗所經過了的一個階段。所謂“文明人”，很幸運地，有了比較聰明的祖先；他們的這些祖先在比較的早期，把他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到現在還滯留在原始生活狀態人們的老祖宗，因為有一點守舊，就沒有跟着改善；因此，他們的子孫，現在還保守着舊的習慣。所以，講到文明人早期的歷史，就資料說，尤其是在那沒有文字紀錄的階段，有很大的部份，是沒有法子，復原它們的。不過，根據古器物學的資料，再加上民族學所描寫現代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我們就可以把不能想像的，難以復原的古代風俗習慣，得到它們反射出來的若干比較可靠的影子。但是，這批資料的運用，也有它的限制；若是運用得超乎於比較參考的範圍過遠，就可能引出很站不住的，甚至於荒謬可笑的議論。因為這些材料具有豐富的刺激性，容易引起史學家的幻想；它們雖然可以幫助我們解答好些上古史的問題，同時，也可以遮蔽研究史學的正當途徑。

第七類：這是我列舉的最後一類，也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

基本的資料。這自然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紀錄。對於這一類材料的整理，本身已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用這些紀錄，作上古史的史料，它們的價值，却極不相等；有不少的部份已經證明是後代人偽造的。如何辨別這些龐雜的資料，及評定它們的價值，均需要長期的訓練與研習。經學、史學，在二千年前，本來已是專門之學；尤其是經學，在西漢的時代，就有官置的博士弟子，專門照管它們；就是在民間，每一經的傳習，也各自成家。後來，因為普遍的讀經，一般人似乎把它們所需要的特別訓練，倒忘記了。在現代教育制度裏，科學的部份，所佔的時間已經是很多了。恢復普遍讀經，這一運動大概是行不通的。但是，把經學當着一種專業研究及傳習，不但是應該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我想，我們似乎可以恢復，漢代為經學設博士弟子的優美傳統，在大學裏，把講習經學一門也設專門講座；至少要把研習經學這一課，與數學、物理同樣待遇，或者更加重視。對這一倡議，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就是，我們必須把這一門學問的研究，安置在純學術的基礎上。有了這一類的經學研究，我們一定能在短期間，得到長足的進步。如此，不但中國古代傳下來的經學可以發揚，治中國上古史的人也可以受惠不淺。

丁 材料的選擇

這七門內容很豐富的專門研究，在現代學術上，是各自獨立的，成了幾種專門的學問。它們與上古史，究竟各有多少關係？

却要看我們所懸擬的研究範圍，以及着重點。就中國上古史說，亟待解決的問題，雖說是多方面的，但是，據我個人看來，有兩個基本課題，比其他題目更為重要。這兩個課題的一個，是構成中國民族的人種問題。通俗一點說，最早的中國人是從哪兒來的？或者說，是如何開始的？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在有文字記錄以前，過的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這就引起了我們基本課題的第二個——中國文化的開始。我們所稱的中國文化，在遠古的時候，是種什麼樣的性質？表面上這兩個題目的範圍，都受了同一的限制，就是說，均以中國區域為限。如果我們要追蹤它們開始的一段，我們也許發現，這兩組研究，並不能在這個區域限制以內解決。

現在，先從第一個問題說起，中國人是哪兒來的？我們既不能承認司馬遷的五帝本紀，給了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我們只有靠地下資料來處理它。地下資料究竟能解答多少？却是寫上古史的人，在現階段尚難作充份的說明。對於解決這問題的困難，有一部分是晚期歷史所造成的；因為，據體質人類學的材料說，中國民族的構成，在歷史期間曾經過若干變化。若推尋到歷史以前，我們所面臨的這一大問題中的小問題，為在那時候，黃河流域的中國人，是否全是現在中國人的祖宗？倒過來說，現在的中國人，是不是那時創造三代文化的人的子孫？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尚沒有滿意的解決。我們只能就比較簡單的幾方面，做一個研究的起點；現在，我們已經有的，可以供給解決這問題的地下資料，都由考古學及古生物學，蒐集得來。在這裏，我們並

不能花很多的時間，討論這一問題。不過，我們可以說，因為地下材料的發現，現代中國民族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可以說在黃河流域一帶，已經具有遠到新石器時代的歷史了。就是說，在華北一帶，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創造者，他們的體質，與現代華北的中國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是我們的話只能說到這裏。假如我們要進一步問到更早的時候，這就要牽涉到材料本身的問題，及整個黃種人，即所謂蒙古種形成的問題。這個問題，雖說是離我們現在的問題較遠，但是，在中國上古史中，却是很重要的。說到蒙古種在現代人種學上，他們早期的歷史，尚沒有清楚的交代。蒙古種的形成，也許就在東亞這個區域，地域上與中國很接近。他們早期的形成，也就構成了中國民族早期最重要的一段歷史。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有從搜尋更多的地下材料着手。在過去五十年來，所發現的這一類有關的資料，雖是不多，不過東尋西找的結果，出現了若干線索；譬如：研究北京人出名的魏敦瑞教授，他就在北京人的身上，認出來若干體質特徵為蒙古種人的。這並不是說北京人與蒙古種人有什麼直接關係，至少我們沒有任何證據，做這一個判斷。但是，生物學家可以說，由北京人的體質，經過相當的時間，可以進化到現代蒙古種人所具有的更進步的體質。這雖然只是一個懸想，同時，從北京人到現代人距離也相當遠，時間至少在三十萬年以上，這中間，生物的演變很難說定；不過，在沒有更好的材料以前，我們要說中國上古史，却有時不能不提出這一類懸想來。以上我提出這一個問題有關的材料，不但要說出它的重

要性，同時也要說出它的複雜性。這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一長時期的研究，與材料的蒐尋。這是寫上古史的人，不能隨便地或輕易地放過的問題。我們必須認清它的真實性；這問題的本身，不但是一個體質人類學的課題，也是一個文化人類學的課題，更是一個歷史的基本課題。它所牽涉的範圍，可以說與所有研究“人”的科學有關。換句話說，我認為要明白中國民族本身是如何開始的，我們必須先瞭解蒙古種的原始。但是，蒙古種的原始，與現代人類的原始問題是分不開的。就東亞這一區域說，我們在最近的一千二百萬年中，所經過的地形的變動，及各種重要的哺乳類動物的演變，已經有若干資料，可以供給我們研究這一大問題的若干方面。這批資料，描寫了這個區域內，一千二百萬年上下的環境演變。在這一千二百萬年中，東亞的氣候，與地形，至少經過了五次大變遷。就華北一帶說，化石學家把哺乳類動物的品種的演變，做過很詳細地比較。民國三十年，在中國工作將近二十年的一位法國籍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神甫，在北京出版了一本書“早期的人在中國” Early Man in China；裏邊附了一張哺乳類動物化石的地層分佈表，詳列着這個區域內，自上新統初期起，到更新統晚期止，五個分期的動物化石。其中最早的一期，即上新統初期，採集所得的哺乳動物化石經過鑑定的有二十二種；這二十二種哺乳類動物的壽命，一直延到最後一期，即更新統末期的，只有五種：其餘十七種都滅絕了。中期的，即上新統晚期，或更新統早期，收集的哺乳類動物化石有四十三種；但是，傳到最後一期，也只有二十二

種，約全數的一半。最後的一期，即第五期的哺乳類化石，只有三十二種；裏面有五種是不見於早期，而是最後一期出現的。

這五種裏邊包括着現代人的老祖宗，即“有辨的荷謨”(Homo sapiens)。我把這批材料提出來，想借用它說明兩件事：(1) 經最近五十年來科學家的努力，我們對於東亞這個區域，尤其是中國這一部分地形的演變，以及動植物的變遷，已經聚有一輪廓的知識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對這一千二百萬年的中國的環境，應該有了真正地了解，不是荒渺難稽了。有了這些知識的背景，我們再談人類的原始，尤其是與晚期歷史有親切關係的現代蒙古種人，已經有了一個很堅固的開始；至少我們應該知道，哪些話我們可以說，哪些話我們不應該說的；自然，我們離解決這問題尚遠。假如我們能够順這條路追尋下去，終有到達的一天。

由此我們再轉移到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我們若是承認中國民族問題，與全部人類的原始問題，是分不開的，我們同時也應該承認，中國文化早階段，只是人類早期文化的一面，好像希臘、埃及兩河流域文化，只是人類文化的幾個面。假如我們有了這個了解，我們對於中國區域內，最近所發現的若干史前材料，也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得到一種適當的解釋。古生物學家說，東亞所見的早期的哺乳類動物化石，實在只是普遍分佈在歐亞非三洲，留在這一區域的代表。換而言之，那時候的地形，即上新統初期的地形及氣候，可以使那時的高等動物，也就是哺乳類動物，毫無阻礙地，西到大西洋，東到太平洋，南到印度

洋；到處遊動生活着。這種情形雖說是，因為山脈河流的改變，漸漸地也隨着改變了，但是對於較晚出現的，自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仍舊存在着。早期人類在舊大陸的移動，是相當自由的。因此，早期人類文化地域性的發展，也沒有晚期那麼普遍。就是晚期，近代史學家已漸漸地證明，人類的文化，比人類自己的足跡，傳播的範圍要寬廣得多。我這個意思就是說，人類的文化普遍性是自然的，地方性是偶然的。假如我們說中國上古史所表現的事實，很多部分與別的區域的上古史類似的，這個並不奇怪。最近半個紀以來，考古學家與地質學家所累集的這類知識，已經相當豐富了。自北京人直到新石器時代最後的一期，我們發現了紀錄在史前的每一階段的文化，留在中國的遺跡。這些文化並且常與別區域類似階段的文化，有若干相像的地方。這一點證明了我上邊所說的意義。假如我們一定要強調這些文化地方性的色彩，或者認為這些文化，只有在這個區域是比較早的，或者與其他區域沒有關係：——這些說法，常常可以把我們領到死胡同裏去。但是，這並不是說，文化絕對沒有地方性的色彩；地方性的色彩，往往是解釋某一區域，在某一階段文化很重要的一個說法。不過，像別的說法一樣，也只能解釋現象的一部分。在中國，我們已經見到的史前材料，也有不少可以證明，完全是由這個區域環境造成出來的。譬如，蒙古種人本身的若干品質，有一部分也許完全是地方環境發育出來的。舊石器時代以後，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中，有不少成分完全是東方性的。這些我們必須分別處理，然後可以得到清楚的認

識。歸根地說，我們應該知道，人類的文化是累集的。人類所經驗的最現實的一件事實，就是在這累集的過程中，無論他的智慧發展到多高，他必須借重環境的資源所供給的材料，然後他的智慧才能得到發展。環境的不同，就是造成地方色彩的基本原因。人類智慧的普遍相同，也就是創造文化普遍性的基本原因。我們就從人類學、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以及民族學的資料，我們所得到的，有關這兩個基本問題的答案及解釋，證實了以上的說法。

戊 古史料的整理與古史的寫作

整理田野考古發掘所得的資料，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把地下發掘的資料，與傳下來的紀錄資料連綴起來。這是一個普遍的考古問題。也是在中國區域，考古家所面臨的問題。譬如，在四十年前，仰韶文化才出現的時候，考古家所研討的，就是仰韶文化在中國上古史裏，所佔的時間與地位。跟着仰韶文化的發現，就有更老的舊石器時代文化，與北京人等一大串更驚人的發現。這當然更引出來這些資料對中國上古史的意義，及它們與現代中國文化的關係等問題。民國十七年開始，在蔡院長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工作，也開始了。我們選擇的第一個發掘地點，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殷墟考古工作的重要，及它為全世界注目的原因，就是在這個遺址中，我們發掘出來了大批中國最早的文字材料；即：——大家所知道的甲骨文。甲骨文的最初出現，遠在安陽發掘以前三十

年。經過了這次發掘工作，它的價值更爲穩定了。研究院的發掘，便是把這批材料，加以科學的裁判。與這批文字同時出現，同樣重要的，還有大量的其他實物；這些實物有一大部分，可以與早期的，即沒有文字紀錄的史前實物——如陶器、石器等，做一種比較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它們的若干“親屬”的關係。又有一部份可以與晚期，即殷以後周秦歷史期間的實物——如青銅器、玉器等，做一種比較研究。所以我們有殷墟的發掘，可以說我們得到了一批承上啓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它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一個强有力的連繫。三十年來研究的結果，從事這一類工作的人，當然經驗過許許多多的曲折問題。有好多這一類的問題，直到現在尚不能解決。不過，也有若干重要的結論，似乎可以用作奠定新的中國上古史寫作的基礎。這些結論也是多方面的，極複雜的。如何選擇，也是要看用這些材料的人，對於上古史的看法。這批材料所供給我們的，就我個人看來，一種最重要的貢獻，便是歷史學家可以對於殷商文化的真實性質，得到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這個認識是什麼呢？就是，假若我們專論這個階段——即殷商時代的中國文化，它已經到了一種高度的發展。它發展的背景，我們認爲是一種普遍傳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這種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築了一種偉大的青銅文化。而青銅文化本身却有它複雜的來源，這些來源中，有一部分，我認爲是與兩河流域——即中央亞細亞有密切的關係。若是我們把歐亞非大陸，在最近一千二百萬年所經過的變遷，及動植物移動的歷史

弄清楚了，這一現象可以說是並不奇怪。史學家研究這一階段文化，所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干不能解釋的成份，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都不是憑想像所能解決的。它們的解決，需要更廣濶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

在大學教書人的心中，以及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寫一部中國上古史？對於這一工作有興趣的人，在他開始工作以前，似乎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1）要知道我們祖宗的過去，是人們很普遍的興趣。在先前，人們都以說故事的方法，講人類的開始。在知識初期發展的兒童們，沒有一個對說故事不感到深厚的興趣的。比較成熟一點的民族，尤其是有文字的民族，差不多都有一種創世的傳說。埃及、巴比倫、中國、以及墨西哥，都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傳說，雖說大部分是想像的，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實際的根據。到現在，歷史這門學問，雖說是已經科學化了；但是，科學的事實，並不能滿足人類普遍的要求，因為，它們是乾燥的，嚴峻的，不能隨着感情轉動的事實。它是沒有血肉的一堆枯骨。把這些事實如何點活？在枯骨上如何加些血肉？不但是科學家的工作，也應該是歷史家更重要的課題。（2）但是，科學家無論他如何努力，仍不能應付有血肉、有靈魂的一般人類感情中的願望；所以，歷史家在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說得簡單一些，一個歷史家，不但應該根據科學的事實寫歷史，同時也應該用文學的手段

寫歷史。這裏邊有衝突沒有？這是一個大問題。代表文學界最高境界的詩人，在他高興的時候，也許可以用歷史的故事，寫出動人聽聞的史詩，如印度的故事詩，與荷馬的故事詩。但是，若說要他們完全遵照科學家的意見寫詩，那就好像強迫一個少女，遵照體質人類學家的意見化裝一樣。我們常聽說，文學家說科學家是動物界裏的爬蟲：站不起來，也飛不動，只能挨着地面爬；意思就是說，科學家只能抱着一大堆事實。文學家是靈活的飛鳥，在空中翱翔，有他們的想像。至於文學家寫文章，是不是完全造謊？完全憑想像？事實上並不如此，文學家所表現的是另外一種人類生活的事實，說得神秘一點，文學家所描寫的，是：人類的靈魂、他們的情緒，以及喜怒哀樂的變動，不是任何實物所能表現的人類的內心生活。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一面，但却是考古學及其他若干有關的科學，不能找出直接材料的部分。因此，我個人的意見，覺得要預備寫一部中國上古史，我們不但要參照鐵的事實，我們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但是，這個想像力應該是有控制的；換一句話說，我們對於若干科學的事實，不能因為我們的好惡而有所取捨。就是說，無論我們用任何文學手段寫上古史，我們不應該寫出違背存在的科學事實。尤其是對於時間問題，現在的科學家，已經有若干方法把它標定，所以對好些歷史事實，在時間程序上，已經作了一種肯定的安排。歷史家必須沒有條件地接受與承認。但是，科學事實的發現是一種累集的工作。無論它發展到什麼階段，尤其在歷史方面，總是不可能完備的，總有若干空

白，若干缺口。這些空白缺口，不完備的部分，如何補充它？如何描寫它？這就完全要看文學家的手段了。我希望不久的將來，有一部這樣的中國上古史出現。

己 可以供史學家參考的幾條意見

第一、史學家應該充分地採用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與研究人類，有親切關係的部門。譬如：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近半世紀來，研究東亞的材料所得到的成績，把地球近一千二百萬年，在這一區域的演變，已經很清楚地報導出來。在這一長期間運行不息的變動環境中，所有高級動物的新陳代謝，以及最早的人類，在這兒出現的故事，可以說得不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並且到了相當準確的程度。「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已由詩人的想像演化成了科學的描寫。

第二、但是我們要小心，科學成績的價值也是不相等的；因爲它受到社會一般的重視，冒牌的科學，甚至於有計劃的欺騙，都在科學界發生過。不過這一類的事件，尙可以辨別；最應該防備的，是借用科學的理論，發揮個人的偏見。這些不成熟的半調子的科學歷史觀，已經在中國的史學界，出現過不止一次了。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外國籍的漢學家，曾經把若干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近代地域的分佈情形，用作解釋兩千年前的中國歷史，並做了若干推論，說中國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響。這完全是對於民族學的一種誤解。我們現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學家，想利用各種的時髦的社會學理論，解釋中

國上古史。但是他們不但對於社會學本身這門學問沒有下過功夫，連中國上古史的原始資料，也認識不了許多。不過一般的讀者因為他們說法新穎，往往就迷住了。這一類的發展，對史學本身這門學問是不幸的。

第三、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歷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為本院故院長蔡子民先生九十五歲誕辰紀念日，本院與北大同學會聯合主辦之紀念會，假座臺灣大學校本部森林館，請李濟之先生作學術講演。李先生此次講演，引起學術界人士極大之注意，演詞曾經各大報轉載，但皆係節錄今將全文刊布于此。本集刊編輯委員會謹識。

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